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材料

(二)

-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闻 迪 (1)
- 对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新现象的看法 张 一 (32)
- 怎样看待中国的“穷” 高 狄 (39)
- 为什么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安治国 (51)
-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吴树青 (58)

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宣传》编辑室

一九九〇年三月



91453089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闻 迪

1989年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年头：200年前发生了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国大革命，50年前爆发了给世界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之火，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才超越了它的局限性，提出了更高的社会变革的蓝图。为什么在世界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小小星球上，在相距不过20来年的时间里竟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无疑是值得一切善良的人民反复深思的问题。世界虽然正朝着缓和而不是冷战的方向发展，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却不能忘记从两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去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教训来。

不久以前，中国的一些自称受到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精神启迪的政治“精英”们，发动了一场旨在结束中国的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的运动。一时间，一些青年学生与社会人士纷纷走上街头，骚乱不仅产生而且从北京向全国蔓延。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已经出现，而且似乎有人正在为建立新政府奔走安排。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一个紧迫的实际问题。中国真的需要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吗？一场大动乱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正当人们为中国将来的发展忧虑的时候，中国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这

场骚乱。世界上没有万全之策，中国政府为了国家的稳定，采取了其他政府面临同样局面也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事情的结局并没有按照那些政治“精英”们的预想发展，这就留给每一个不愿看到中国再次陷入动乱的人们一个深思的机会。

中国已经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了吗？

中国需要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吗？

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到了必须被推翻的地步了吗？

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一个仍处在社会变动时期的中国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它们就像幽灵一样萦绕在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头。

23年前，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错误的领导和坏人的利用下，有过一场非常左倾的骚动；而近年来，不少大学生在政治“精英”们的带领下，又有一场非常右倾的骚动。这两种骚动或者说走极端，虽然都反映了青年人充满民族忧虑的呐喊，但却都不是他们已经相当成熟的表现。青年知识分子最令人钦佩的地方是他们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而他们的弱点则往往是缺乏严谨的科学的精神以及实现理想所必须的正确方法。

从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起，自由就被认为是对规律的服从。而认识规律，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各种不同的评说。法国大革命已经两百年了，人们至今没能找到统一的评价。不久前出现的这场风波，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国民党方面给这

场动乱以极高的赞美，认为是谱写了“自由民主的新篇章”，大概是从中看见了“光复大陆”的希望。历史的确往往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曲折、更复杂、更捉弄人。历史又是开放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有时要许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如果那些政治“精英”们推翻共产党、重建资本主义的美梦得以实现，那么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就该推倒重写了。

让我们转过来讨论前面的那些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不能形成共识，而又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来解决这些分歧，动乱就有可能再发生。

一、中国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

政治“精英”们对形势的估计是自相矛盾的。当他们以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自居时，他们便大叫要保卫十年改革的成果，要防止有人把十年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好像十年中取得的进步都是属于他们似的。而一旦他们需要大学生的支持时，他们便描绘出一幅耸人听闻的画图：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独裁专制，官倒横行，仁人志士飘流海外，忠臣良士尽陷冤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那样，又有什么改革的成果可言？挟危言以欺人，似乎不听他们的话，中华民族便会落到万劫不复的地狱之中。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实不足为训。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

早在1971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在堪萨斯城有一个著名的讲话。他指出现今的世界存在着五个强大的世界经济实体，那就是西欧、日本、中国，当然还有苏联和美国。

“正是这五强将要决定经济的前景，并且将以各种方式在本世纪的后30年中影响世界的未来，因为正是经济力量是决定

其他力量的关键。”尼克松大概是第一位认识到中国已经开始步入强国之林的美国总统。其实，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强，即使是在那基础上又已经翻了两番的今天，我们仍然不算太强。我们的强大在于这些年中一直保持着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发展速度，因而有希望赶上和超过之。尼克松先生当时无疑已经看出了这个趋势。无论如何，这个趋势一直保持着。

那些怀着一腔热血走上街头的爱国学生几乎没有不希望国家迅速发展的，政府与参加学潮的大多数人之间本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事情发展到那样难以收拾的地步，值得人们深思。我们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经历的动乱之多，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自从清王朝被推翻以来，动乱或者战争连绵不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才大致安定下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40年中，没有战乱，在人口倍增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至少有了温饱的生活，国力增强之快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人”这个称号在共和国成立以前是没有什么荣光的。老罗斯福总统就爱用“中国人”来指斥那些愚蠢、低能的人员。“中国人”这个称号渐渐的有了点尊严，那是发生在朝鲜战争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之后。美国人不能被低能儿所打败，低能儿也不应该握有原子弹，这对那些主张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不言而喻的。倘若历史能倒转，让那些学潮的领导者有机会接受老罗斯福的一次“赏赐”，或者让他们有机会在南京街头目睹两个日本军官各自一口气杀掉100多中国老百姓的“比赛”，他们或许能够明白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诞生的那个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价值，而不至于那样急不可耐地要用台湾式的或美国式的共和国来取而代之。不论中国政府在它领导的40年中犯有多

少错误，但这40年是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统一和开始步入强国之林的40年，是中国人逐步为自己赢得尊严的40年，也是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的40年。要推翻这样一个政府是需要进行论证的，靠制造骇人听闻的流言，最终不能成大事。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逐渐拉大的。在工业革命前，中国与它们的生产力水平相差极小。在1750到1950这两百年间，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差距几乎扩大到近100倍。比如说，我国在1952年人均占有钢铁仅2.5公斤，到现在才刚刚超过54公斤，而美国在1920年人均占有钢铁就达到350公斤。这种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差距，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从经济水平来讲，我们只能称为二等国家，或者说一个区域性大国。从生活来讲，我们仍然属于低收入国家。毛泽东主席早就提出要争取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看来这个愿望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国家多么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只有一个长时期稳定而又快速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才有可能使我们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建立起一个把世界上最新科技成果囊括其中的中国新文化圈，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几十年前发出的赶上西方人的宏愿。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心无芥蒂地为作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可是，怎样才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环境呢？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历史的机会不常有，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抓住它、珍惜它，机会也就一去难回了。

无论中国现在还多么穷，如果与40年前相比，中国人民正处在一个新的出发点，一个大发展的前夜。我们现在已经能年产10亿吨煤、6000万吨钢铁，那就是说现在一年的工业

产值比50年代10年还多。中国不是没有问题，中国政府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如果把中国的形势扭曲为已经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那是很难服人的。中国今天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中国人民完全有希望在90年代干得比过去更好。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摔了很多跟头。如果我们能正确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它就会变成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中华民族虽然古老，但是对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却没有经验，不但人民没有经验，国家领导人也缺乏经验。改革是“踩着石头过河”，弄不好就会出乱子。这次动乱给国家以及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当然它更不会给那些政治“精英”们带来他们期待中的任何好处。

今后的三四十年对于中国至关重要。中国亟需迅速强大起来，才能从容面对各种无法完全预测的风险和挑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需要迅速得到提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保持政治上的基本稳定。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有必要在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来进行。如果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智慧集中到这样一个政治共识上——竭尽全力去改善而不是去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避免一场代价巨大的动乱发生，那么，中国将来的发展无疑是大有希望的。

与此相反，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转而接受推翻现政权、重建资本主义的种种政治设计，那么中国的将来就有可能为一些或大或小的动乱所困扰，而无法把力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去，甚而重新出现上半个世纪那种战乱频仍的不幸局面。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现时这一批以“民主斗士”自誉的政治

“精英”们在一场大动乱后有机会上台组织政府，推行他们那一套恢复私有制的“救国方案”，他们也必然会被种种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问题所困扰，而无力追回一场可能包括内战在内的大动乱所造成的损失。现时的政治“精英”们大多是一些自以为西化了的文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又缺乏实际的社会生活的知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不惜进行政治冒险，把学潮引到与国家机器正面冲突的死胡同。

对那些认为不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就没有前途的政治“精英”来说，打倒中国共产党和推翻中国政府就成为实行任何政治变革的前提条件。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推翻现存的国家机器，或者用学生们的命去“唤醒民众”。学生只不过是实现他们政治目标的物质力量。他们与现政权之间的冲突自然无法调和。学生的悲剧在于，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推翻共产党、重建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但又无力挣脱政治“精英”的控制，从而造成了有违初衷的后果。他们的政治目标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来实现。中国需要建设性的、理性的、沉稳现实的、精明全面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亟需减少破坏性的、肤浅的、浮躁浪漫的、轻率片面的臆断和盲动。中国经历的大动乱已经太多，中国不需要一场新的大动乱。这应当是每一个爱国者从当前的反思中所达到一个最重要的共识。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了吗？

主张在中国重建资本主义的人早就提出过一个论点：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他们有时为中国的前途焦虑不安，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武断的基础上。如果说这个论点

是一个大胆的假设，那么小心求证的文章却几乎没有见到。开放使许多年轻人第一次看到东西方之间的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巨大差距，但在惊讶、羞愧之余，却很少有人认真地分析差距的由来。在这种非历史的情绪支配之下，社会主义制度便成了替罪羔羊，似乎一旦资本主义重新确立，问题便马上可以得到解决。的确，如果社会主义已经、或者说从来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桎梏，它的存在价值早就丢光了。好在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中国分别有了几十年的实践，这个问题已经可以用实际数字来回答，而不致陷入争而不决的理论旋涡之中。

我们先来看看苏联的情况。为了不使结论跟着感觉走，有必要横看、竖看历史。一旦明白社会主义首先是在比较贫穷的国家，或者如列宁所说在帝国主义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建立起来，这个问题本没有争论的必要。苏联是最老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国力仍然与美国有相当的差距。据台湾当局公布的数字，1985年美苏两国的人均总产值分别为14090和6350美元，苏联只及美国的 $1/2$ 。可是，如果考虑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俄国与美国相应数字的比值大约是 $1/8$ ，我们就不能在整体上说社会主义使苏联的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不前。十月革命前，俄国一直是欧洲列强中生产力最落后的。它在1910年生产300万吨生铁和2500万吨煤，大大低于英国的1000万吨和2.7亿吨，德国的1500万吨和1.5亿吨，更不必提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革命后的内战严重损伤了苏俄的经济，使它在1928年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从1928年到1938年的10年中，苏联进行了两个五年计划，苏联与美国的人均工业水平迅速地从 $1:8$ 缩小为 $1:4$ 。苏联在1926至1938的12年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7倍半以上，其发

展速度之快是令人震惊的。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却处于“大萧条”时期，它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返回到1929年的水平，其部分原因还得益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知道苏联人在当时所创造的世界经济史中的一个奇迹。一位西方学者最近对此评论说：当时苏联“制造业产量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之快——即使人们采用更为小心的估计——在工业化的历史中的确是没有先例的。”不论斯大林在那时干了多少错误的事，苏联在30年代的大发展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没有这个大发展，很难想象苏军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决定性胜利。到了1950年，苏联的经济实力已达到英、法两国的总和而接近美国的 $\frac{1}{3}$ 。两个超级大国的局面遂告出现。苏联的经济发展迟缓发生于70年代即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后期。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它的农业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它的困难部分来源于多年庞大的军费开支。现在，苏联人民正在进行改革，他们究竟能不能摆脱眼前的困难，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但是社会主义使苏联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步入一个工业化了的国家，显然是无需争辩的事实。美国的经济也不是没有问题，别的都不说，请看一看美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1985年美国政府的赤字达到2028亿美元，目前的国债已近3万亿美元。如果这个趋势不扭转，到了2000年美国国债有可能高达13万亿美元，一年要偿还的利息将为15000亿美元。美国的贫富差别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是最大的。美国社会中最贫穷的 $\frac{1}{3}$ 甚至没有多大兴趣行使他们的投票权。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至少有300余年了，它至今仍在克服它的危机与困难中向前发展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与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加快的趋势。阶级结构的某些变化以及

人民生活平均水平的提高，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社会主义来到世间才几十年，它带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理想与敌视它的资本主义斗争着、发展着。有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呢？

我们再来讨论中国的情况，看看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救中国。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在1952年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低于英国的1860年，德国的1890年，接近俄国的1910年。我国在1952年仅能生产钢135万吨，而日本在1938年已达到700万吨。弄清楚我们的出发点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在1845年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把英国工人当时悲惨的生活如实地反映出来。如果按人口平均，我国在1952年的工业水平顶多只及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即18世纪的后期。这是令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无地自容的难堪局面，然而它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样的一个水平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如果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必然重现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种悲惨景象。

在那些从来没有忍饥挨饿的青年学生，以及那些也许并没有恶意却在竭力否定我国经济发展成果的青年们的导师中，恐怕没有几个清楚地认识到新中国的出发点在哪里，有的人甚至忘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有的人非常羡慕西欧、北欧、北美已经高度发展了物质文明，而往往不懂得人家是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其中包括血腥的殖民掠夺和非正义的战争。所以，如果要想对中国40年经济发展的成果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有必要知道共和国的出发点在哪里。共和国的出发点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要算差的，比如说印度在1914年已经有铁路5万多公里，而我国在1949年仅有2.2万

公里。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表明，中国的发展速度不仅高于我们的邻国印度，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在1963—1984年间发展速度一般要比印度高2到3个百分点。而印度的发展速度也并不太差，它在1980—1985年间比台湾与日本的发展速度还稍快。让我们再看看印度与中国的工业发展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字说明，中国的工业生产在1965—1984年的20年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印度8个百分点，即使是在“文革”发生的10年困难局面下，它的增长率也是接近10%而大大高于印度的不足4%。因此，只要我们稍有耐心研究一下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作的估计，我们都还没有理由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由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字还表明，在1950—1978年间，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总产值一般增加了5倍，而中国则为15倍以上。正因为这一点，中国现在的人均总产值水平大约达到了英、美1900年的水平，换句话说，中国人在过去的40年中走完了英国人花了100年稍多的时间走过的路。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人口上亿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毫无疑问，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一些重大政治与经济问题时有过严重失误，如果没有这些失误，中国的发展还会快一些。可是，要想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出差错，那又是多么苛刻的要求。我们不妨举目看看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所出现的问题。有时候，比如说墨西哥，国家弄到了破产的地步。有的国家借的外债变成了沉重负担，比如说巴西就举债约1000亿美元。这些国家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经验可为遵循，还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尚且有出问题的时候，更何况我们是在一个封建积习深厚，且又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被封锁、被孤立甚至被敌视的情况下。

下，搞社会主义。

能不能用台湾的经济发展来说明大陆的社会主义搞糟了呢？我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确比台湾要差一大截。台湾公布的1985年两地人均总产值分别为290与3142美元，就是说大陆仅及台湾30年代的水平。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有着许多有利条件，比如说：1、日本人占领台湾达50年之久，在此期间已经为台湾经济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例如修铁路、建海港、办学校等等，连日本人留下的地质图现在都仍然能用。2、美国人提供的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3、国民党逃台时带去的大量资金。4、国民党统治中国20余年中积累的经验，以及统治失败后所必须吸取的教训，例如台湾的土改。5、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以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出口导向的经济。6、参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所获得的种种优势。7、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8、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当然还有其他的有利因素。在以上的一些条件下，不是中国大陆那样广大的地方可以获得的。由于台湾与大陆的发展条件有许多不同，不可用台湾的发展来否定大陆的社会主义。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国民党没有被推翻，大陆继续搞资本主义，大陆的发展水平也比不上台湾。国民党统治大陆22年没有什么作为就是证明。

日本占领台湾50年，这对台湾今天的发展影响甚大。因为台湾被日本霸占后已经不是一般的殖民地而是日本国土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优于大陆的省份，比如说台湾在1952年的农业人口仅占人口的52%，这个数字反映台湾当时的工业化远比大陆的省份为好。如果拿台湾与日本的水平相比，其间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台湾经济发展的有些重要指标不见得比大陆更好，电力就是一例。电力

恐怕是最能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了，台湾电力发展很快也是人所共知的，光核电厂就建了好几座。台湾在1952年共发电14.2亿千瓦小时，与大陆的73亿千瓦小时相比约占1/5。这说明台湾与大陆的工业发展水平当时已经有巨大差距。1985年台湾发电526亿千瓦小时，与大陆相比，比重下降为1/8。水泥产量则从相应时期的1/6下降为1/11。日本在3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了西欧诸强的水平，当时属于日本的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虽逊于日本本土，却远高于中国大陆。如果再把香港放进这个序列里，我们看到日本优于香港，香港优于台湾，台湾优于大陆，这样的形势至少在30年代就已经形成而且至今仍然保持着。正如不能要求台湾的经济超过日本一样，人们不应要求中国大陆的经济超过台湾。如果说台湾的经济水平在50年代就已领先大陆大约30来年，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今天的大陆与台湾之间有这样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

一个没有政治偏见的人，不但应该看到台湾的经济成果，而且也不可否定祖国大陆40年之重大进步。非常令人奇怪的是，有的政治“精英”几乎根本不愿意正视这个巨大变化。

有的人显然忘记了这40年中有多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辛勤地劳动。在他们眼中似乎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好逸恶劳，无所事事，从而造成了今天这种落后的局面。真是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与之相比，不少西方学者或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要客观得多，这些人大多为中国发生的变化感到惊讶。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让我们透过一位专门研究世界列强力量盛衰的学者的眼光来考察这个问题。他说：在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仅占

2.3%，它的整个工业潜力仅占英国1900年水平的70%。军阀混战、日本人的侵略以及其后的内战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这个国家的繁荣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这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已经翻了一番。尽管“大跃进”与“文化革命”明显地减缓了经济的发展，到了1980年，它的钢产量达3700万吨，已经远远超过英国或法国的产量。同年，它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比重已由1973年的3.9%增加到5.0%，接近西德的水平。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亚洲巨人正在朝着一个真正强国的方向运动，而且有建立这个地位所需要的经济基础。从1953年到1980年，这位学者看到了中国的什么？看到了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过去的200余年中，中国的国力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如果说在1750年时，中国还可以说是一个强国，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弱国，几番被人割地赔款，无异于被砍手断足。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竟然沦落到受人宰割的地步，何也？就是因为国力衰退。而这种衰退局面的根本扭转，则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发生的。

人们没有忘记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大家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的情景。难道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穷兵黩武吗？当然不是。中国人民吃帝国主义的亏太多了，深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那就没有民族的尊严和自由。中华民族为什么讨厌洋奴、买办、汉奸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向外国人摇尾乞怜的人？这并不是落后意识或排外心理。这个民族有它值得骄傲的过去，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自尊与自信。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也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坚信这个民族有它光

辉煌灿烂的未来。让我们来看看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作何估计。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中国与印度在1985—2000年间分别按8%与7%的年增长率往前发展，而欧洲四大经济国则保持它们1970—1982年的平均速度，那么，如果现在中国和印度与欧洲四强相比其国民经济总值还有较大差距的话，到了2000年，中国就会远远超过意大利和英国，其总值比法国只低30%。如果这个假设得以维持，中国的总值在2003年就会超过西德。到了2020年，中国的总值就比西德与法国加在一起还多。文章的作者还认为，中国比印度更有可能实现这个远景计划。现在，经过调整，中国的年增长率将为6%左右，即使按此速度发展，到21世纪初期也可以赶上意大利和英国。

有的人看见了社会主义的种种弱点，心里总在虚构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会有多少好处，人们当然可以去想他自己之所想。但我们已经看见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至少不比印度的资本主义差，也不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差，这至少在西方许多政治家或学者的眼光中是这样。笔者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说是很成功，因为中国人还没能创造出自己的经济奇迹。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大体成功的，因为它至少创造了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它进行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探索，犯了不少错误，也因而多了许多经验教训。中国的经济非常有可能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而且非常有可能在21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经济奇迹。

中国的事情要靠身在大陆的中国人来办，中国的困难也要依靠他们去克服。我们要告白自己的努力，靠我们的智慧与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453089

辛勤的劳动，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赶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如果说印度人民常常表示对他们独立以后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话，我们中国人更有理由为自己40年来的各种进步感到自豪。

一些政治“精英”们对中国目前形势的分析是冲动的，片面的，脱离实际的。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现实中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贡献，那将是国家、民族之幸事，因为他们大多富有才华和知识，很可以有一番作为。但是共和国自有它的功臣和真正的精英，那就是在40年中埋头苦干、不断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物质与精神财富的人。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不可能从一个远远低于英、法、德的经济水平的起点，一跃而有希望赶上和超过之；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那样快地造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与洲际导弹，并由此彻底改变了惧怕帝国主义列强的心态。与此相比较，那些正在为重建私有制而奔走呼号而又可以托庇世界资本主义的保护与金钱支持的人，在今后对中国的贡献将会是什么？他们的政治纲领决定了其行动纲领，那就是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稳定，制造动乱，以便乱中夺权。这种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便是祖国经济稳定而又迅速的发展。人们不会忘记“文化革命”中有人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来反对工人们的正常生产活动。而今天的“爱资病”患者已经比那些人走得更远，他们正在煽动人们起来破坏生产。有的人甚至一再进言，恳求外国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如果说他们原来还打着爱国的旗号，现在是连这块遮羞布也不要了。为了自己一时的政治野心，不惜牺牲祖国经济的正常发展，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是炎黄子孙？

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一个基本事实。在